

索取号: 1109.9/8.531

南京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基督教文化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影响

作者:	孟宪爽
院系:	文学院
指导教师:	王文胜
学科专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 1、坚持以“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从事研究工作。
- 2、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研究成果。
- 3、本论文中除引文外，所有实验、数据和有关材料均是真实的。
- 4、本论文中除引文和致谢的内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 5、其他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孟宪来

日期： 2007.5.4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南京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作者签名： 孟宪来

日期： 2007.5.4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前 言	III
第一章：对基督教语汇的吸纳	1
第一节 基督教词汇和意象的运用	1
第二节 圣歌及《圣经》的引用	4
第二章：创作内容的充实	9
第一节 《圣经》的解读和改写	9
第二节 基督徒形象的塑造	11
第三节 基督教主题的书写	15
第三章：艺术形式的借鉴	21
第一节 U形叙事结构	21
第二节 圣歌的创作	23
第四章：作家价值观的建构	26
第一节 价值立场——神之爱的介入	27
第二节 批判对象——原罪	29
第三节 价值指向——终极	33
结 语	37
参 考 文 献	39
后 记	42

摘 要

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现代文学中基督教文化传统、基督教传播的现状和神学思想的建设使基督教文化影响着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这种影响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呈现出一种驳杂凌乱的面貌。

本文就基督教文化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影响这一课题进行系统的分析，从作品和作家两个角度探究，并指出它的价值意义和缺失。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归纳新时期以来文学对基督教语汇的吸纳。这种吸纳包括基督教专有词汇和意象的运用以及对圣歌和《圣经》的引用；第二章理清基督教文化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内容上的影响。具体是指对《圣经》进行解读和改写，塑造了大量神职人员、平信徒等基督徒形象，书写了原罪与忏悔、苦难与救赎、爱等基督教文化主题；第三章分析艺术形式上对基督教文化的借鉴。在小说的叙事中形成了U形结构，文体上出现了圣歌的创作；最重要的是第四章，探究了基督教文化对作家价值建构的影响。在我们传统文化爱的基础上神之爱介入，确立了作家爱的价值立场；在批判时进行超越道德的艰难跋涉将批判的对象指向原罪；同时在价值的追寻中，引入了基督教的终极观念，将价值的对象指向终极。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基督教文化丰富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的语汇，充实了作品表达内容，为作家的价值建构提供了方向。但同时也看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对基督教文化大多是表层的吸收，作家对《圣经》存在误读和曲解，作品中的批判和皈依都简单化。

关键词：基督教文化；新时期以来文学；语汇；艺术形式；价值观

Abstract

Since foreign country literary work translating, in the modern literature the Christianity culture tradition and Christianity disseminate the present situation has caused the Christianity culture to affect the new time literature.

This kind of influence by the different form, displays in the different aspect, presents one kind of heterogeneous disorderly appearance. This article mainly from to the work and to the writer twoangles, from the vocabulary, the creation content, the artistic technique and the writer values constructs constructs four aspects toanalyze this kind of influence. First is to Christianity vocabulary buying in, including Christianity appropriation glossary and image utilization as well as to Religious poem and "Holy Bible" quotation; Two, the creation content obtains theenrichment, the partial writers carry on Reading and rewriting to "Holy Bible", has portrayed massive Christian image and so on the clergy, even follower in the work, and wrote the pardoned crime, the misery, the confession, has redeemed and so on the Christianity subject; Simultaneously in the artistic form also has the model, formed the Ushape narrative pattern in the novel structure, in the literary style appeared the hymn and prays the prayer the creation; Most importantly, in to the work influence beside, the Christianity cultur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writer values to construct the construction, loved in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foundation has established the lovest and point which love of the god involved, When critique carries on object direction pardoned crime which thesurmounting morals difficultly will climb mountains and cross riverscriticizes, simultaneously in ultimate tracked down has introduced in the God belief foundation ultimate concern, will pursue the objectaimed at the other shore.

Through analyzes us since to discover the Christianity culture has enriched the new time the literature vocabulary, enriched the work expression content, has provided theponder god latitude for the new time literature. But simul taneously exposed the writer to understand the cursory understanding notprofound disease to the Christianity culture.

Key word: Christianity culture; Since new time literature; Vocabulary;

Work content; Artistic form; Values

前 言

基督教文化影响着新时期以来作家的文学创作。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四种途径：一是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西方一些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作品传入中国，表现在作品中的基督教色彩和精神影响着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卢梭的《忏悔录》，他们对世界、自然和人类的认识和看法影响了很多作家的创作；二是现代文学中基督教文化传统。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现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如许地山、冰心等，他们将对基督教的理解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中国基督教文学¹。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不可避免的吸纳了他们的文学传统，在作家的创作中也体现了基督教色彩；三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现状。新时期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活跃，信徒增多²，一些作家甚至皈依了基督教，如北村、余杰等；同时，中国教会逐步开始了与各国教会的友好交往和互访活动，加强了与世界基督教徒的联系和理解，基督教文化不可避免的成为作家笔下表现的对象。四是神学思想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大量神学书籍得到了译介、编著和出版。刘小枫为代表的文化基督徒对基督中国化和中国化基督的研究与思考。刘小枫在《走向十字架的真》、《圣灵降临的叙事》等展开了传统文化与神学的对话，对汉语神学进行了探讨，基督教学术研究开始影响更广泛的文化领域。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不管作家从哪个方面去体认这种文化，基督教传播新的变化、人们对基督教文化新的认识都不可避免的引起作家的关注，成为作家写作的素材。

对于“基督教文化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关系这一课题的研究，现在主要存在四种状态：一、在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时简单的提及基督教文化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如王本朝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中在详细阐释了张晓风、海子、北村与基督教的精神遇合。二、在对作家或者作品进行个案评价时，分析了基督教文化给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带来的影响。如傅新海《北村：写作的皈依与摇摆——从〈施洗的河〉到〈强暴〉》、从新强《海子诗歌的神性向度》，等论文，从一部作品或一个作

¹ 参见刘丽霞：《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6页，作者对“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基督教文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大致状况。

² 目前，据基督教全国“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统计，我国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达1600万，教堂及活动点总数超过5万个，有近3000名牧师、1.5万名教职人员和近11万名义工。全国有18所神学院、圣经学校，共出版发行3000多万册圣经、1400多万册《赞美诗（新编）》。

家出发，侧重作品的基督教主题、意义和神性的研究。三、部分评论者评述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体裁的作品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如杨剑龙《论新时期小说与基督宗教——从小说观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以新时期的小说为切入点，反观了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四、少数评论者进行了全面、系统、有意识的综合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相对系统的论述何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是山东师范大学从新强的博士论文《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等，他立足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作一历史的描述，同时探讨其对当代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价值建构意义。

虽然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早有论者论及，但以往的著述大部分集中在“基督教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这一课题上而忽视了其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而且比较零散，角度单一。基督教文化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哪些文本在哪些方面体现了这种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有什么价值和缺失？这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就基督教文化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影响这一课题进行系统的分析，从作品和作家两个角度，语汇、创作内容、艺术手法和作家价值观建构四个方面去分析这种影响。并指出这种影响的价值意义和缺失。首先，归纳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对基督教语汇的吸纳。这种吸纳包括基督教专有词汇和意象的运用以及对圣歌和《圣经》的引用。专有词汇和意象的运用体现了对基督教不同的接受和理解，有的对这些词汇进行表意的借鉴，有的是直接表达了宗教内容；圣歌及《圣经》引用在文本中的作用也不同，有的统领了全文，帮助作者表达文章的主旨；有的起到谋篇划局的作用，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有的营造了一种宗教气氛，传达了宗教倾向。然后，理清了基督教文化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内容上的影响。基督教文化在创作内容上的体系有三种类型，一是对《圣经》进行解读和改写，二、塑造了大量神职人员、平信徒等基督徒形象，三是书写了原罪忏悔、苦难救赎和爱等基督教主题。第三章分析艺术形式上对基督教文化的借鉴。在小说的结构中形成了“乐园——犯罪——苦难——忏悔——得救”的 U 形叙事模式，文体上出现了圣歌的创作；最重要的是第四章，探究基督教文化对作家价值观建构的影响。在我们

传统文化爱的基础上神之爱介入，确立了作家爱的价值立场；在批判时进行超越

道德的艰难跋涉将批判的对象指向原罪，同时在价值的追寻中，引入了基督教的终极观念，将价值的对象指向终极。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基督教文化丰富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的语汇，充实了作品表达内容，为作家的价值建构提供了方向。但同时也看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对基督教文化大多是表层的吸收，作家对《圣经》存在误读和曲解，作品中的批判和皈依都过于简单化。

第一章：对基督教语汇的吸纳

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圣经》的汉译，产生了大量基督教的专有语汇。这些语汇传达了固定的意象，逐渐被大众所接受，同时也影响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进入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新时期以来文学对基督教专有语汇的吸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专有词汇和意象的运用。这种运用有两种形式，表意的借鉴和宗教内容的表达；二是圣歌及《圣经》的引用。当圣歌及《圣经》被引用时，它们在文章中出现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不同，或者统领全文，表达文章主旨，或者推动情节发展；或者暗示了基督教的宗教倾向。

基督教语汇在新时期以来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丰富了文学的表达，是基督教文化影响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一个具体体现。

第一节 基督教词汇和意象的运用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基督教专有词汇和意象，这些词汇和意象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圣经》的汉译产生的，从词汇的运用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是来自基督教的影响。

很多作品直接使用基督教专有词汇和意象命名，在题目中就体现了浓厚的基督教色彩。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题目中，许多具有基督教色彩的词汇出现频率较高，如天堂、十字架、忏悔、夏娃、上帝、地狱、复活等，如马力的《炼狱和天堂》、莫言的《天堂蒜苔之歌》、张雄辉的《挣脱了十字架的耶稣》、王一飞的《戴金色十字架的姑娘》、晓剑的《中国知青忏悔录》、雷明耀的《红卫兵忏悔录》、严歌苓的《也是亚当，也是夏娃》、莫然的《夏娃行动》、周晓枫的《上帝的隐语》、徐恒进的《上帝派来的人》、残雪的《地狱中的独行者》、朱文华的《爱的复活》以及韩少华的《大弥撒之思》、李辉的《静听教堂钟声》、海南的《生命圣经——一个母亲在怀孕十个月中的絮语》、海子的《弥赛亚》等。这些词汇背后的故事和所蕴含的意义为大多数人熟知，作家运用这些具有基督教色彩的词汇作为题目来统领全文，能够简单精练的表达作品的主题。

除了题目之外，新时期以来的作品内容里运用了更多的基督教专有词汇和意象。张贤亮的作品《习惯死亡》，对耶稣有多次描绘；铁凝的小说《埋人》中的人物多以《圣经》中人物命名，这些都是运用基督教专有词汇和意象的体现。而在诗歌中，上帝、伊甸园、十字架、耶稣等词语被频繁使用，曾卓、绿原、西川、舒婷、海子、伊蕾等诗人在新时期的创作的诗中都有这些意象。如绿原《重读<圣经>》中“福音”、“摩西”、“人之子”、“犹大”等众多的意象；西川的《黑雨》中“基督”和“撒旦”；舒婷《复活》中的“十字架”和“耶稣”；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女性年龄》中的“上帝”，《罗曼司》中的“圣父”、“圣子”等。

专有词汇和意象的运用体现了对基督教不同的接受和理解，有的是对这些词汇进行表意的借鉴，将他们的宗教含义同自己的理解、感悟寻找共鸣，使词汇失去宗教的本意，指代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状况；也有的是直接表达了宗教内容，用词汇指代宗教，直接反映了与基督教相关的生活。

一、 表意的借鉴

新时期以来的部分作品运用了基督教的专有词汇和意象，但仔细考察我们发现，有些作品使用这些词汇的时候，并不涉及宗教内容。作者是从基督教历史或圣经故事中选取个别的词汇或情节，同自己的生活经历，切身体验以及文化背景结合，寻求差异和共鸣，进行表意的借鉴。基督教词汇的意义发生了转移或者误读，在作品中的运用更加侧重的是传达作者自己的认知。

“天堂”这个词在很多作品中没有了基督教中的含义，只是一种美好人生和境界的代称，是一种完美状态的代名词。韩洁羽的《我的上海我的天堂》描写的是上海的购物、美食、名胜、风情，“天堂”指上海物质的繁华；刘莉的《能在天堂走多远》，“天堂”代表的是一种原有的、理想的生活状态。

张士敏的《荣誉的十字架》，在全书的最后一段写到：

他觉得那不是一只背篓而是一只沉重的十字架。

不过那不是耶稣背上的十字架。

是荣誉的十字架。¹

“十字架”在基督教中有很多意象，但这里没有了“爱”和“宽恕”的意义，只是表示了一种负担，以及在这种负担之下人的变异和荒诞。伊蕾的《罗曼司》

¹ 张士敏：《荣誉的十字架》，作家出版社，1989年，第267页

中：

——你可知道

风媒花旷世的清白

以及

以及圣父、圣子的千年哀荣¹

这里的“圣父、圣子”传达的是一种时间的更古，命运的变幻，失去了宗教中对圣父、圣子的赞美、感激和祈求。西川的《黑雨》中：

他不是基督也不是撒旦

甚至不是玩笑也不是寓言²

“基督”和“撒旦”仅仅是善、恶的两个代表名称，是对基督教世俗化的一种理解。周晓枫的《上帝的隐语》中，“我所理解的‘上帝’，除了指天地万物至尚的创造者与统治者，还意味着命运、法则以及不可言说之物。”³，作者表达了自己对上帝的一种理解，上帝的含义被扩大化，有着泛神论的色彩，改变了基督教中“上帝”这一意象。

张洁的《方舟》，以《圣经》中挪亚建造的，用来躲避洪水灾难的方舟来命名，并借用其中孤独、绝望，又对拯救怀有希望的意向。这部小说描写三个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人到中年又因为不同的原因各自离开丈夫相聚在一起。她们如同乘住在方舟上，经受着生活海洋里风浪的拍击和颠簸。这里用“方舟”来象征三位独身女性在现实中的绝望处境和和他们渴望救赎与庇护的精神状态。

张贤亮的作品《习惯死亡》中，对耶稣有多次荒诞不经的描绘，“在砰的一声枪响之后，我看见赤裸裸的耶稣性感地躺在一片白云之上……”⁴。作家通过描写“我”对传统意义上圣洁的神之子的亵渎性想象，来烘托被命运扭曲的“我”心灵的空虚与荒谬，宗教中的神圣和他的描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种荒诞感油然而生。

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在表意的层面上进行借鉴，借助这些词语蕴含的内容，传达自己的写作思想和目的，传达自己对世界的一种体悟和看法。宗教

¹ 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106页。

² 西川：《西川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

³ 周晓枫：《上帝的隐语》，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⁴ 张贤亮：《习惯死亡》，作家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词汇从宗教的神坛中走下来，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

二、宗教内容的表达

除了表意的借鉴之外，一些作品中基督教特色的词汇就是用来指宗教内容，表明了作品和基督教的关系。在表现宗教人物或活动时，作家不可避免的使用了基督教专有词汇和意象。这些词语的含义可能也发生了某种转移和变化或者误读，但都确定无疑的和基督教有关，指代或暗示这一宗教。

铁凝的小说《埋人》中人物的名字为彼得爷、耶利米等，这些词汇暗示这里当年曾盛传基督教，用名字勾画了故事的背景。而这些人物在“埋人”这一事件中处处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谋划和盘算，毫无神圣可言，又与他们的名字形成了对比，具有反讽的效果。

王一飞的《戴金色十字架的姑娘》，这里的十字架指一种饰品，也反映了对基督教的信仰。金色十字架是叶萌的母亲，一个修女，留给叶萌唯一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全书讲述了围绕十字架，也就是围绕基督教信仰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冯育楠的《十字架下的冤魂》讲述了“火烧望海楼”天津教案的始末。马宏宽出于对修女沙玛人品的敬重，救助她脱离了人们反侵略、反宗教的怒火。最后却被清政府处死，做了十字架下的冤魂。

韩少华的《大弥撒之思》描写了弥撒时的宗教氛围，并对一个共青团员虔诚的态度做了特别的描绘，追问当下人们信奉基督教的潮流的缘由。

在这些作品中，基督教词汇的含义不再游离与宗教之外，而是与这种宗教发生了深刻的关联，传达了宗教意义和内容。

“一个词语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意象也就象征这一个意义的新天地。”¹，基督教专有语汇的借鉴使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在表达上有了基督教的色彩，丰富了文学的语言空间和表现能力。几个简单的语汇往往就营造了宗教的氛围，语汇背后的含义也能帮助读者更加清晰的理解文章的主旨。

¹ 梁工、卢龙光编：《圣经与文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422页

第二节 圣歌及《圣经》的引用

直接引用圣歌及《圣经》原文是具有基督教色彩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形式。

新时期以来很多作品都直接引用了圣歌及《圣经》原文，北村小说的一大特点是《圣经》原文的大量引用。在安妮宝贝的《莲花》、王蒙的《十字架上》、余杰的《香草山》、舒婷的《最后的挽歌》、罗灏白的《被上帝遗弃的女儿》、林鹿的《母爱星空雨》、刘浪的《浮生独白》、莫言的《丰乳肥臀》、艾伟的《爱人有罪》、北村的《消灭》、张清平的《林巧雅》、罗灏白的《被上帝遗弃的女儿》、周成平的《姐姐》等作品中，也都可以找到圣歌或《圣经》原文的踪迹。

圣歌及《圣经》原文在新时期以来的作品中大量出现，它们在文章中出现的位置和形式不同。以北村的小说为例：有题记中的引用，如《张生的婚姻》的题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¹；有书中人物的阅读，如《公路上的灵魂》中“阿尔伯特随手翻开《圣经》，打开的《诗篇》第七十三篇二十五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²；有传教士的宣讲，如《愤怒》中李百义逃亡之际曾听牧师讲解《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行淫妇人的故事。

圣歌及《圣经》引用在文本中的作用也不同，有的统领了全文，帮助作者表达文章的主旨；有的起到谋篇划局的作用，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有的营造了一种宗教气氛，传达了对基督教的宗教倾向。

一、表达文章主旨

很多作品在题注上就引用了《圣经》的原文，用来统领全文，表达文章的主旨。

安妮宝贝的《莲花》在开篇之前直接引用了《圣经·启示录》中的原文：“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³，并以此来引发读者的思考，表达了文章的主旨：信仰的力量和其对生命的改变。文章中，

¹ 北村：《公民凯恩》，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8页

² 北村：《公路上的灵魂》，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³ 安妮宝贝：《莲花》，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9页

庆昭身患绝症，滞留在高原。偶然的机遇，她伴随房客善生去墨脱探访善生的老友内河。在去墨脱的途中，通过善生的讲述，内河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一个反抗世俗，不断追寻的女子。三个人代表了人在生活中的三种不同状态，他们面临不同境遇，却有着类似的精神困境。最终尽管肉体可能走向了死亡，但他们都在人生这一艰辛的路途中获得了新生。

刘浪的《浮生独白》也是用圣经的原文做题记：

耶和華上帝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配偶幫助他。

——《舊約全書·創世紀》¹

這篇文章反映了人與人，特別是男女之間的關係。它講述了我弟弟岸以及他面臨的困境：對橋和草的舍取。作者通過對上帝造男造女最初意圖的描寫，反襯互動的純美關係破壞後人的孤獨、無助和人內心的絕望境地。最終，弟弟的猝死實際上成了必然的結局。

用聖歌或《聖經》句子來表達文章主旨，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中較為普遍。文學作品是對人類境遇的描繪，而《聖經》中一兩句話往往就能深刻的表現了人類的境況——生活或者精神，二者之間很容易找到契合點。

二、推動情節發展

聖歌以及《聖經》的引用在一些文章中推動了情節的發展，它們是故事建構的基礎或者是情節發展的一個轉折。

史鐵生的《我的丁一之旅》中作者用《聖經》原文來設立自己文章的背景，在“引文與回想”中引用了“‘太初，上帝創造宇宙，大地混沌，沒有秩序。怒濤澎湃的海洋被黑暗籠罩着。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後來，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把生命的气吹進他的鼻孔，他就有了生命。’（《舊約·創世紀》）”²等《聖經》原文，講述丁一的身份，設立了整本書的背景。將他的引文與《聖經》原文的比較可以發現，史鐵生對《聖經》的引用有字句的改動，如原文“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創世紀 2:7），在這裡變成了“他就有了生命”，這種變動縮小了經文原來表達的內容，“有靈的活人”即包括生命也包括靈魂，而“生命”一般只是指肉體的生命，不涉及靈魂層面。

北村《張生的婚姻》中《聖經》的出現和閱讀是整個故事的一個轉折。已成

¹ 劉浪：《浮生獨白》，《大家》，1995年第1期，第66頁

² 史鐵生：《我的丁一之旅》，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2頁

为哲学教授的张生为了爱情割腕自杀，但依然挽救不了爱情。神却拯救了他，他被《圣经》的《罗马书》和《马可福音》所“征服”，《圣经》的阅读不但使他获得了平静和力量，并促成了他对基督教的皈依，实现了命运的转折。“张生的泪水打湿了《圣经》，他开始祷告。一边祷告一边流泪，这些眼泪和光一起清洗着他的身体和灵魂，结束一个人。一身的缠累突然间消失了，周围鸦雀无声，张生被一只温暖的手托住，光芒中的安息笼罩了他。祷告完了，他站起来，看见一切都更新了，周围变得比原来更安静，连阳台上的花也被赋予连生命。张生与所看到都一切重新接近，并在与他们都融合时，充满温暖。”¹，是《圣经》使张生获得了新的生命。《消灭》中程天麻是生活的强者，他一直依靠个人的力量来控制这个世界，凡事都要争先。在成功面前，他逐渐变得自私、自大，丧失了爱的能力。当死亡逼近，肉体消亡的结局摆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脆弱，试图寻找依托。而杨福音等基督徒吟诵的《有一地比正午更光明》：

有一地比正午更光明，
路遥遥我用信常望见，
我天父久已在那边等，
将会晤众圣徒于里面……²

天父的存在和对它的依托是对程天麻的寻找的一个回应和暗示，也是他可以平静面对死亡的一个转折。北村的还有很多小说《圣经》都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如《愤怒》、《施洗的河》、《玻璃》等。

作品用《圣经》原文来推动故事的情节，使主人公下一步的行为有了过渡和理由。他们要么得到了情感上的共鸣，要么从《圣经》中吸取了力量，完成了皈依。

三、营造宗教氛围

圣歌和《圣经》的引用可以营造出一种肃穆、平和、安宁的宗教氛围，表达宗教的倾向，反映人物内心的渴望和追求。

艾伟的《爱人有罪》是缘于爱的悲剧故事。书中三个主人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恋，可是却屡遭伤害，甚至彼此之间也是互相伤害。面对这个世界，他们体认最深刻的是罪孽和罪。他们想要依靠爱来解脱自己身上的罪感，却发现始终都

¹ 北村：《公民凯恩》，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² 北村：《消灭》，《大家》，1995年第1期，第62页

是徒劳的。人们相互之间爱的能力遭遇挫折，用自己的爱来拯救自己的愿望也落空。当他们最终都走入绝望境地的时候，圣歌的声音响起：

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光之中……

“他们的声音温柔而和谐，好像这人世间充满了生趣。至少在他们的吟诵声和歌声里，人世变得光华无比。”¹。在经历了风浪之后，通过圣歌来表达在苦难的人生中，内心深处对基督世界的羡慕和追求，同自己的绝望现实做了对比。

罗灏白的《被上帝遗弃的女儿》中有祈祷仪式的描写，她们同声祈祷着“我们发生哀告耶和華，发生恳求耶和華。……义人必环绕我们，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们的。阿门！”²这种祈祷表达了他们对正义和良善的追求，对丑恶的唾弃。在宗教氛围中表现对美好人性的理解和追求。

《林巧稚》中病中的林巧稚和白和懿一起轻声吟唱“……你心里的光是否亮着？问你自己，问你自己；你心里的光是否亮着？请你回答这个问题，请你回答这个问题。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要你发光，照亮周围各自地方……”³圣歌的吟唱烘托了宗教的气氛，反映了林巧稚渴望照亮别人的精神，也是对她不断牺牲、奉献的一生的吟唱。

圣歌和《圣经》原文的引用出现在新时期以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之中，同简单的词汇和意象的借鉴相比，《圣经》的引用包含了更多对基督教内涵的理解和认识。

基督教专有词汇和意象的运用，圣歌及《圣经》原文的引用都体现了基督教文化在语汇方面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影响。在语汇的吸纳之中，实现了基督教语汇从单纯的宗教语言向本土经验和个人感受的转化和升华。在语汇的吸纳过程中，大部分作品不涉及到宗教文化的精神实质，更多的是世俗意义上的理解。

¹ 艾伟：《爱人有罪》，《收获》，2006年长篇专号春夏卷，第171页

² 罗灏白：《被上帝遗弃的女儿》，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64页

³ 张清平：《林巧稚》，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392页

第二章 创作内容的充实

除了在语汇方面，基督教文化还影响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创作内容。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圣经》的解读和改写，基督徒形象的塑造和基督教主题的书写。作家从个人视角对《圣经》进行解读和改写，传达的是在我们的文化视野中对基督教的认识。基督教的人物包括神职人员、平教徒，作家对他们的塑造丰富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人物图谱。基督教主题包括原罪、苦难、忏悔、救赎和爱，新时期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反映和表达了这些主题。

第一节 《圣经》的解读和改写

作为基督教的文化典籍，《圣经》引起了新时期以来的作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的作家对《圣经》进行个人色彩的解读，有的作家取材于《圣经》中的故事进行改写，这都是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表现。在解读和改写之中作者一般融入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传达了一个同神圣经典不同的《圣经》。

一、《圣经》的解读

《圣经》的意义被作家进行了私人化的理解、阐释和运用，他们的解读往往透漏出强烈的个人视角，体现了作者本人对基督教的态度。

张雄辉的《挣脱了十字架的耶稣》中佟宁对贺玉珊的一段说教：“难道你没有发现圣经的虚伪和上帝的残酷吗？亚当与夏娃只不过在撒旦的引诱下，偷吃了一个分辨善恶的果子，上帝却给予如此严酷的惩罚，以致人类的千秋万代，未出娘胎便担着‘原罪’，还故弄玄虚，在人间借腹怀胎弄个独生子耶稣当替罪羔羊骗人。请问，自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以来，又有多少灵魂因之而得救呢？”¹。佟宁仅仅将《圣经》作为故事来分析其中“上帝”这一人物形象，在一个浅显的层面来批判这种宗教，来让贺玉珊放弃对这种宗教的信仰。

周国平的《读圣经札记》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世俗化的一个代表，作者完全抛开了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以及在漫长的发展中所给予《圣经》的文化意义，而

¹ 张雄辉：《挣脱了十字架的耶稣》，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411页

是通过自己的视角，单纯的将其看作对人和人性描写的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去进行解读和思索。

余杰的《香草山》，也通过通信的形式，传达了对《圣经》的理解和认识，两个主人公之间在对基督教的理解中寻求到了共鸣。

对《圣经》解读在作品中更普遍的是以零落的句子的形式出现，是一种情感上的体悟。

二、《圣经》的改写

齐宏伟的《彼岸的跫音·夏咏集》第五辑中《真理是什么》、《死，活》分别从比拉多和巴拉巴的视角看待耶稣走向十字架的故事。在“真理是什么？”的追问中，在生与死的差别中，让我们认识真理，认识耶稣。这类改写根据作者的想像，增加了很多经文中所没有的细节，但其主旨和《圣经》原文保持了一致。

王蒙在《十字架上》告诉读者一个不同的耶稣基督的故事，是他想象和理解中的耶稣基督。他对人们观念中对耶稣进行了改写：由于偶然性和神奇的力量，他由人之子变成了神之子，不是他印证了《旧约》中的预言，而是他按照预言去生活，去完成使命。神迹带有特异功能的性质，十字架带有表演的性质。耶稣走向十字架的路途具有戏剧性和嘲讽的力量，而且他满怀了恐惧，没有办法再走下来。在“启示录”中则是对信徒们无尽欲望和自私本性的嘲讽。王蒙将现实和历史错综在一起，表现了人之子耶稣走向十字架前，在十字架上和这之后的一系列遭遇，以及人对宗教各种各样的态度，充满了对人性中自私和贪婪的嘲讽。作者这样的改写是对耶稣形象进行了一种颠覆，虽然许多情节取材于《圣经》，但是他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给予了不同的解读。

冯骥才的小说《末日夏娃》描述了夏娃在末日醒来所看到的景象。小说中，末日醒来的夏娃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里已经不是上帝创世纪时的地面和天空了，没有自然，甚至也没有真正的人类。人类创造出来了类似自然的假自然，自身也“进化”成病态怪异的样子。在这里，人类过分的依赖科技，丧失了对真和美的感受。他们无所不能，似乎取代了上帝，但这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绝望。这里的景况和夏娃记忆中的充满大自然活力和健康的伊甸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然和人类都在人的控制下走向了毁灭。末日的夏娃不断的寻找亚当，企图以此来拯救人类，但最终也没能与他相会。在夏娃的寻找之中，体

现了对人类未来的思索，也充满了对人类未来的绝望。《末日夏娃》所讲述的故事是《圣经》中所没有的，但他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创世纪中对伊甸园的描绘。所有的故事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因此也是对《圣经》的一种改写。

作家在对《圣经》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解读和改写。作者对《圣经》原文所传达的宗教意义有一定的了解，并用其表现现实世界，体现了浓厚的个人色彩，承载着作者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

第二节 基督徒形象塑造

描绘基督教会的生活，塑造基督教人物是将基督教作为写作题材的另一种形式。新时期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发展，教会生活和教会人物成为中国社会的组成部分，当作家在忠于生活的基础上写作时，不管他们抱有什么写作态度，或对基督教文化有怎样的认知、立场和观点，都不可避免的对此有所反应。作家通过对他们生活现状的描述，勾画出了牧师、神父、平信徒等人物群谱。

在对人物塑造的同时，基督教在中国对传播发展状况也得到了反映。特别是随着对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观念的反拨，作品以更加客观的角度来描述人物命运的波折，社会历史的变迁。如史铁生的《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对教会学校和当时人们宗教热情的描绘，《原狱》中对驱赶洋教运动始末的描写。这一部分作品对基督教的态度趋于复杂和多元化，人物形象承载着更多的文化意义，其背后反映着作家的宗教倾向和观点。

在对基督教人物的塑造中，主要产生了两类形象，一是神职人员，一是普通的基督徒：

一、 神职人员

在基督教中，男女神职人员的称呼不同，男神职人员统称为教士，即天主教、正教中的神父和新教中的牧师，女神职人员称作修女，对神职人员的塑造包括对教士和修女的描绘。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很多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史铁生的《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叙说了詹牧师一生的经历，包括对基督教的信奉——背离——重新投入的过程，并以此对他的个性进行分析；孙方友《泥人王》

描写了买通水匪，采用卑劣手段企图获得别人传家泥人，而又真心热爱艺术的洋传教士；刘心武《如意》将德太白和赫爱尔两个性格、道德、处世完全不同的神甫做了对比；周梅森《原狱》塑造了发誓拯救桥头镇堕落灵魂的詹姆斯牧师；莫言《丰乳肥臀》出现了同上官鲁氏有私情的马洛亚牧师，北村的小说《施洗的河》、《我河上帝有个约》、《公路上的灵魂》等作品中创作了一系列引导人走出痛苦的基督形象；冯育楠《十字架下的冤魂》中出现了沙玛修女，华姿《德兰修女传——在爱中行走》讲述了德兰的伟大一生……

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教士有异国而来的传教士也有本土的牧师。异国传教士是基督教教徒中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为了完成上帝的神圣使命，远在他乡异国，感受着异域文化与自身的冲突。莫言《丰乳肥臀》中的马洛亚牧师，出生瑞典，在中国传教，过着中国式的生活。他说着地道的山东高密东北乡土话，并和上官鲁氏生了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一对双胞胎。他在礼拜日的时候在教堂里诵读福音书，但当上官鲁氏让他给孩子洗礼的时候他说“洗礼？怎么个洗法我都忘了。”¹马洛亚将牧师单纯的作为了一个职业，而失去了宗教中的神圣性，代表了教会生活的世俗化。《原狱》中的詹姆斯牧师则将自己的全部精力致力于传教事业，要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他在桥头镇艰辛的开拓着自己的传教事业，关注着现世的生活和灵魂的得救，并时刻对异国他乡的宗教现状进行反思和探寻。马洛亚牧师和詹姆斯牧师是传教士中的两种典型。

《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描述了詹牧师退出基督教转向马列主义的经过。詹庆生靠工读自助拿到了神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教堂里任职。解放后，他开始怀疑有神论，信仰马列主义，对基督教作了犀利的批判，认为主是伪善、骗人、愚昧的，并于1953年自动退出教会。但詹牧师死后，家人发现他一直保留着一张当年获得神学硕士学位时的留影和一个镀金的小十字架。这反映了在詹牧师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彻底放弃基督教的信仰。北村的转型后的小说中，经常会有一个引导人走出痛苦的基督形象出现。《施洗的河》在刘浪其精神恍惚的时候，被一个神奇的声音吸引，他坐着小船顺水漂流，来到杜村受了传道人的启迪，皈依了基督教。同样起到引导皈依作用的人物还有《孙权的故事》中的刘兄弟，《消灭》中的扬福音等。

¹ 莫言：《丰乳肥臀》，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华姿《德兰修女传——在爱中行走》，讲述了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兰修女传奇而伟大的一生。基督教文化是德兰修女价值建构的基础和依托，对她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她在宗教的指引下，实践着爱的原则。

这些神职人员的形象既体现了基督教会神圣的一面又表现了它世俗的一面，作家通过对他们的塑造传达了基督教的不同侧面，表现了基督教文化内涵的丰富性。

二、平信徒

人们抱有不同的态度和目的皈依基督教，据此，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也塑造了多种类型的普通基督徒的形象。有人将皈依基督教看作是一种投机，属于“吃教”类型；有的借助宗教躲避现实的压力或用宗教来建构自己的伦理价值观念；有的在一段信仰经历之后否认和背离这种宗教；也有人真诚的信奉基督教，在基督教中获得了安慰，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生活。

周梅森《原狱》描绘了人无穷的欲望和原罪所营造的世界。基督教信仰只是这个世界构成的一部分，充满了偶发性和投机性，其中的王大肚皮是投机宗教者的典型代表。基督成为他借用的武器和表白的工具。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做出了“有一阵子还把大十字架挂在大赌房里，说是要让万能的上帝来证明他这赌馆的公道无欺。”¹这样的荒唐之举。当他认为自己划不来时就以“信上帝就和念佛吃素差不多，不能杀生的。詹大爷老和我说要爱一切人，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胡作非为了。”²为借口拒绝取杀人，而当利益可以得到满足，“王大肚皮心里再也没有什么上帝和詹大爷了，满心里想着的都是那一成的头钱。”³。宗教只是他利用的对象，是一种工具，失去了任何信仰的力量。

张雄辉的《挣脱了十字架的耶稣》，贺玉珊是在对现实不满的情况下投入了基督教的怀抱。但是这种投入只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而不是她真正的信仰。她借助宗教躲避现实的压力，寻求内心的安慰。这类基督徒随着境况的改变往往就会离开宗教，贺玉珊就在佟宁的“教育”和“挽救”下焚烧了十字架，和基督教脱离了关系。《原狱》中的曹二顺是另外一种依靠基督教建构自己伦理观念的代表。他不过是在上帝那里寻求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认同和共鸣，寻求自我的肯定，“可

¹ 周梅森：《原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81页

² 同上，第183页

³ 同上，第185页

是曹二顺虽然满怀敬畏，却没法和詹姆斯牧师对话，很多时候都是詹姆斯牧师一人在自言自语”¹，曹二顺和詹姆斯其实生活在两种价值观念和话语系统之中。

《地狱与天堂》中的女主人公李宁，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将基督教视为精神的寄托，视为生命。她珍藏着《圣经》和十字架，并时时记得回国前母亲的教导：“万能的主教导我们，要爱人，宽恕人。当有人打了你的左脸颊的时候，你要把右边的脸颊送上去；当有人想要你半件外套的时候，你要把外套脱下来送给他。”²。但当拒绝了褚明对她肉体的觊觎，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后，李宁彻底否定了基督教宽恕的教义。她在内心中说：“如果现在有人来打我左边的脸颊，我一定以加倍的力量来还击他的右边脸颊；如果现在有人要抢我的外套，我一定要扒下他的外套来！”³。她被送进了疯人院，最终投湖自尽。小说以一个带有悲剧性的爱情故事，传达了对基督教的理解和某种程度的赞扬，同时也批判了他的宽恕思想。罗灏白的《被上帝遗弃的女儿》中讲述了圣马里亚中学的学生，基督徒杨柔曼、徐霞玲、田恬等的生活。她们因为信仰被投入监狱，在意识形态的控制和现实生活的压榨下，逐渐放弃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否认了上帝的存在。但在日常的生活中，她们还是经常用一个教徒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张清平的人物传记《林巧稚》述说了基督徒，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一生的经历。她十四岁在教堂受洗，“在牧师的引导下，巧稚垂首接受祝福，接受洗礼，她感到从未有过对宁静、安适。”⁴，从此她便把信仰作为自己生活的支撑，去面对困难和抉择。在她病重的时候，吟唱赞美诗，感到“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处处塌方被重新填充，心灵重新变得温暖而湿润。光泽从内心流溢出来，一直漫溢到全身，弥散到脸上。”⁵。她在信仰中获得了平静，获得了力量，获得了喜乐。北村小说中的基督徒大多都因为信仰而得到了生命的改变，《张生的婚姻》就描写了张生在神的真理前面，采取谦卑的态度，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从而挣脱了撒旦的捆绑，和“神”恢复了关系，获得了新生和信仰，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奇迹。而《我和上帝有个约》中的陈步森，他独特的成长经历让他变为一个没有爱，

¹ 周梅森：《原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00页

² 竹林：《地狱与天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³ 同上，第75页

⁴ 张清平：《林巧稚》，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9页

⁵ 同上，第393页

冷漠无情的罪犯，行凶杀人。但在上帝的感召下他逐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罪，进行艰难到悔改。他接受了自己罪行带来的刑罚，却在属灵的国度中得到了赦免。最后在肉体被判死刑而“死的时候”，他捐出了肝脏，挽救了被他们杀害的李寂的妻子——冷薇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完成了“复活的异象”。刘浪、张生、孙权等都是这一类型的基督徒的代表。林鹿的《母爱星空雨》中，讲述了不同的母亲的故事，也讲述了神奇的信仰力量。正是在信仰之中，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病重的姐姐身体得到了恢复（《长女如母》），吸毒的孩子放弃了毒品（《只有母爱不言放弃》）……

新时期以来的作品中还出现了一些不是基督徒但是亲近、认同基督教，并从中获取力量的人物形象。文革刚刚结束，礼平就以《晚霞消失的时候》传达了对基督教的见解。书中的女主人公南珊曾一度将基督耶稣作为自己思索和信仰的对象，“我并不怀疑我的生命和命运受过他仁慈的救助。因此，尽管我不可能见到他，但是我依恋他……”¹，她以耶稣所传达的爱来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念，支撑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坚韧和宽容。陈丹燕在《绯闻》中通过“我”的成长历程反映了对基督教文化认识历程的变化，在接近和远离上帝中徘徊，这种变化也深刻的影响着“我”的生活。“少女时代的学医经历，却给我一生强烈的对上帝的感觉，虽然我没有皈依基督教，但我感到我当真被（比）许多基督徒都有深切地感到上帝的存在。”²，主人公没有基督教的背景，并非基督徒，但却对这种宗教有天然亲近，具有宗教倾向，是一种自然感情的流露，或是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人生态度、哲学观念上的选择。

对基督教人物形象的塑造，多是从基督教生活的现实描绘出发，展现了不同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形象又表达了人们对基督教理解的不同重点和侧面，传达的是对这种宗教的体认，或褒或贬的态度背后实际上有作家的宗教理解。而这些多面孔的基督教人物也丰富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充实了新时期小说人物画廊。

¹ 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32页

² 陈丹燕：《绯闻》，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9页

第三节 基督教主题的书写

新时期以来很多作品的创作主题展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北村、史铁生、王英琦、王春元等的小说体现了原罪与忏悔、苦难与救赎以及爱等基督教创作主题。余杰、史铁生、周国平等作家的一些散文作品也表达了自己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并偶尔试着用基督教的眼光对世界进行认知和拷问，同时阐释了自己的宗教观念。穆旦、舒婷、顾城、海子、绿原、西川等人在诗歌中反映了他们对基督教的思考，用基督的观念来反观和体认这个世界。

一、原罪与忏悔

皈依基督的北村对基督教文化的“原罪”观念有着自己的理解：“人类在伊甸园子里起首犯了一个很清洁的罪，吃了那颗果子，神明明那么绝对和肯定地告诫人不得吃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弃绝了神的爱，起首走上了一条背逆的路。”¹因此，“一定有一个罪拦阻我们，不承认它，就不会让我们过去。”²他说：“无是论是男女，只要是人，他们都是有罪的……”³对“原罪”的认识在帮助人们随时警惕自身的弱点和罪恶，自觉地进行自我批判的同时，也让人们更好地担负起人对自身、对环境、对人类的责任。

《鸟》中的康生试图用诗构建一个完美的世界。张敏的背叛使康生“活”与“爱”的信心濒于崩溃，但他还可以像光一样时时刻刻光照她，定罪她。然而小芳欺骗性的诱惑却使他“自以为圣”的精神崩溃，面临着对自己“罪”的认识，陷入了无法救赎的境地。康生向天叩问“谁能救我并解除我的罪？”，他试图通过洗澡、焚烧诗稿和道歉来使自己获得平静，但还是无法逾越这个罪，终于在第三次自杀中失去了生命。康生对圣洁的追求和“罪”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他在救赎无门的情况下只好舍弃自己的生命。

在基督教文化中，人出生便意味着原罪，每个人都要克制自我，弃绝自我，不断忏悔自身的罪孽，以便获得宽恕，得到最后的救赎。忏悔，是人类对由自身的思想、意识、行为所造成的“恶”向上帝或自己的一种反省、自责和承担。在基督教文化中，忏悔需要借助一个他者，即上帝的存在来完成。“正如当年刘再

¹ 北村：《爱能遮掩许多罪》，《钟山》，1993年第6期，第109页

² 同上，108页

³ 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寻》，《花城》，1996年第6期，第147页

复式的人道主义的‘忏悔’只是指向道德而不指向终极一样。仅从认识的意义上去企图使知识分子重新起来充当价值载体维系破碎的人心，永远只是理想。”¹，人不是对自己进行忏悔，而是面对上帝忏悔自己的罪孽。忏悔行为远离尘世的现实利益，他所参照的道德标准具有神性，所以个人永远只能接近而不能到达终极目标。

《愤怒》中“忏悔”主题极其明确。李百义杀死了那个将他父亲虐待致死的警察后，远走他乡，经商致富，成为一位品格无可挑剔的慈善家。他企图通过自己的奉献和舍己来克服罪的折磨，但无论李百义怎么做，杀人的罪孽都无法抹去，他不能摆脱灵魂的不安。最后，李百义正视自己的罪，坦然地接受了养女为他安排的道路——被捕归案，用行动进行着忏悔。李百义是一个经历罪恶、参与罪恶、摒弃罪恶的“罪人”，他最后的选择是通过真诚的忏悔来获得救赎。

在铁凝的创作中，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自己理解的西方文化相融合，丰富着文学叙述的文化语境。她的笔下展示了一些痛苦的灵魂，她们的痛苦更多不是外界强加的，而是来自她们对个人罪责打主动承担。《午后悬崖》中，五岁的韩桂心出于对另一名男孩的嫉妒，把他从滑梯上推下来并导致了他的死亡。当她意识到自己灵魂深处恶念的时候，就希望以一种忏悔的方式将过去的罪孽公之于众。她将自己的忏悔录了音，并找到了当年死去的男孩的父亲。相对于儒家的“闭门思过”来说，她这种基督式的袒露内心的忏悔要更加艰难。《大浴女》则讲述了一个罪孽与救赎的故事。尹小跳出于对自己内心罪恶的认识，出于赎罪的心理在内心世界中进行着严酷的精神拷问和灵魂审判，最终在对母亲的宽容和对自我的责难中显现了她忏悔道深度。

王春元所著的《忏悔无门》，是关于慈善家李春平的纪实性文学。面对公众，他忏悔着自己灵魂曾经的缺失。李春平的巨额的财富是以爱的抵押为代价，他想用金钱来获得救赎，但面对淑珍、英子、静楠、金大夫等的沉默和谢绝，他处在了无处忏悔，无处救赎的境地。但对内心的直面，摆脱物质追求之后精神的皈依，让他的良心和灵魂高贵起来。

余杰在坚持自己的批判的立场的同时也宣称我有罪，我忏悔，批判别人也不断清理自己内在的毒素。巴金的忏悔是从自我审视中开始的。对自己，巴金并不

¹ 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1995年第4期，第178页

乐观和自信，认为自己是“奴在心者”，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从自己的受限去思考，使他的反省进一步深化下去，反思自身的同时折射出了人类共同的受限性。

二、 苦难与救赎

对苦难的书写并不是基督教所独有的，人类一直在探究和问询苦难，文学也一直在表现和展示苦难。但基督教神的介入给予了苦难一个更高的关照的纬度，是充满了盼望和救赎的苦难。

王英琦的《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讲述了一个苦苦寻求真理寻求灵魂解脱的人的生活轨迹。经过多年的心灵磨难，终于找到了她的“上帝”，活出了基督的精神。从承认现实的苦难到承担现实的苦难，她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将信仰融进自己的生命。

北村称自己转型后的创作“只是在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而已。”¹。他的作品展示世俗堕落的场面，“诸如逼仄的居室，嘈杂的医院和肮脏的病房，出版社的编辑分配草纸，上涨的肉价，婴儿的吵闹，性爱，卡拉OK，审讯的场面……”²。他笔下的主人公在这苦难的现实生活中深深的沉沦，试图寻找出路。如《施洗的河》中的刘浪、马大；《我和上帝有个约》中的陈步森、苏云、周玲；《伤逝》中的超尘；《最后的艺术家》中的杜林、谢安、柴进等。《强暴》中，刘敦煌与美娴本来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但是，由于一次意外的身体强暴，导致了他们婚姻和爱情的彻底溃败。身体的意外暴力给他们的精神带来了心灵暴力的阴影，甚至最终当他们再次相逢时已经由恩爱夫妻沦落为一对嫖客和妓女。美娴向刘敦煌伸手索要嫖资时，我们看到人对苦难的无法超越。

在这些庸常之上，北村那里还有一个更高的纬度，一个终极意义的拯救者。“北村决不肯像一些新写实作家那样，允许他的人物自得其乐地徜徉在这些尘世意象之中，北村所设置的故事情节终究要将人物逼上绝境，迫使他们回答：为什么活着！”³。“重要的不是痛苦本身，重要的是为什么痛苦以及是否有摆脱的途径。”⁴他试图通过“苦难/救赎”模式来表现想象力缺乏的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在他的笔下，在苦难中沉沦的主人公从事业、爱情、艺术、婚姻等方面寻找终极

¹ 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第66页

² 南帆：《先锋的皈依——论北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第53页

³ 同上，第53页

⁴ 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对北村的书面访谈》，《花城》，1996年第6期，第148页

意义的依靠,但这些现实世界的东西总是无法给人满足,所有他们只有两种结局,一是找到基督得到救赎,一是问询没有答案,陷入了更深的绝望,甚至自杀。前者如刘浪、张生、李等,后者如孔丘、超尘、康生等。

“没有拯救就无所谓堕落;没有盼望,就无所谓绝望。绝望就是达不到所盼望的,这说明其内在的参照应该是盼望,离了所盼望的,绝望的深刻性是相当有限度的。”¹,这是神性纬度对苦难书写的意义所在。单纯对苦难的叙说和主人公麻木或顺从的忍受只是叙写了“存在”这一主题,而没有涉及存在之上更高的意义,书写也就变成了无意义的对生活的记录。神的关照,使约伯的询问有了应答,也使人有了超越苦难的可能。

《施洗的河》讲述了刘浪走向灵魂觉醒的过程。刘浪生活在一个缺少温情的家庭,长大后他继承了父业,以恶抗恶,不择手段地贩卖烟土,杀人越货。与此同时,他在精神上找不到依托,以致最后走到精神崩溃的边缘。但他读医科大学时,一位奉读《圣经》女信徒却一直对他产生着潜在的影响。在他的灵魂经历了无数波折扭曲之后,终于实现了精神的皈依。北村通过刘浪的形象塑造完成了“生存—苦难—救赎”的基督教主题,鞭笞了世俗生活的“恶”,鲜明的显现了他的神性选择和精神指向。

三、爱

初志英的《彼岸》反映了现世生活中对爱的确认,对自我和他人关系的认知和体察。“心里有恨的人不懂得爱别人,也不知道爱自己”,是对基督教精神的形象化阐释。

史铁生在《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原罪·宿命》、《钟声》等作品中通过不同人物以及自己的际遇表现了对基督教不同层面的理解,有关涉世俗的意义也神学上的追问,引导读者也在不同的层次思考。笛安在《芙蓉如面柳如眉》中“讲了美,讲了信仰,讲了尊严”²,刻画了夏芳然、丁小洛、徐至等充满神性的人物,让他们在特殊的际遇中感受着罪与救赎,神圣和世俗。余杰的小说《香草山》中则以通信的形式,讲述了自己对基督教的理解,展现了爱的圣地——香草山,表达了爱的主题。

基督教主题的书写还体现在散文中,余杰、史铁生、周国平等很多作家都有

¹ 孙绍振:《<水土不服>:绝望的写作》,《小说评论》,1996年第2期,第7页

² 笛安:《芙蓉如面柳如眉》,《收获》,2006年长篇专号春夏卷,第304页

很多散文作品表达基督教主题。周国平将基督教作为自己思想的源泉之一，他的大量杂文体现了对基督文化的思索。他通过《上帝眼中无残缺》、《论宗教》等文章讲述了自己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赞赏，并偶尔试着用基督教的眼光对世界进行认知和拷问。余杰在《压伤的芦苇》中用沐浴在爱中写作来诠释着对《圣经》和基督教的理解，并写道“最近一年多来，我开始吸取全新的精神资源，开始调整固有的文化结构。我一点点地减少自己在生活和写作之中的傲慢、独断、怨恨、轻蔑这样一些情绪和姿态，而以爱、谦卑、同情和怜悯这样一些内在的质素来替换它们。”¹。余杰通过文字感受爱，接近爱，传达爱，分享爱。在对信仰的仰望，对自身罪恶的反省之中，他反思着我们的文化资源和生存环境。散文《压伤的芦苇》是他生命历程转变的标志，也是他的宣言。

苦难与救赎、原罪和忏悔、爱等基督教主题的书写显示了关注人生存价值的宗教情怀，并在此基础上表现了对人类存在本质的痛苦思考，体现了对人终极价值的关怀。有些主题是人类所共通的，如“苦难”、“爱”等，但基督教文化的介入给了我们不同的理解和解答方式。

《圣经》的解读和改写传达了作者对宗教的理解，基督徒的塑造丰富新时期人物画廊，基督教主题的书写提供了人新的思考空间，表现了对世界的追问和探寻。这些都充实了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内容，使文学作品有了更加宽泛的表现领域，展现了基督教的影响。

¹ 余杰：《压伤的芦苇》，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第三章：艺术形式的借鉴

基督教文化在艺术形式方面给予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小说创作中的 U 形叙事结构¹和圣歌等新文体的出现。罪孽与忏悔，堕落与拯救，受难与皈依等基督教主题在书写中往往呈现出 U 型结构，在这一叙事结构中，主人公一般历经“乐园——犯罪——苦难——忏悔——得救”的过程。而在圣歌的创作中则通过对宇宙、自然和人的赞美来赞美造物主的伟大，表现了心神契合的宗教境界。

第一节 U 形叙事结构

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在《圣经》的阅读和接受中，新时期以来的一些作家特别是北村的小说创作中有意无意的接受了濡染，在小说的叙事上可以看到人物“乐园——犯罪——受难——忏悔——得救”的经历，在罪孽与忏悔，堕落与拯救，受难与皈依中展现了这种 U 形的叙事结构。

《张生的婚姻》具有典型的 U 型叙事结构。张生本来生活在乐园般的景象中：他年轻有为，29 岁就担任哲学教授，并且与美丽文雅的贵都大酒店服务员小柳相爱，准备结婚，但小柳却在与张生去办结婚证的路上变卦。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化是由小柳引起的，如同在《圣经》里，也是夏娃偷吃禁果而导致“罪”进入了人类。小柳将这种原本平静的生活颠覆，这也导致了张生和小柳关系的破坏。在这之后，张生陷入了痛苦绝望的境地，他没有办法使小柳回心转意，也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痛苦。他甚至在贵都大酒店当着小柳的面割腕自尽，虽然没有死成却也仍没能挽回他们的婚姻。张生甚至有杀死小柳再自尽的想法。张生的状态正是失去了神庇护的人的状态的写照——对人生的无能为力。在痛苦之中，是神拯救了他。在他阅读《罗马书》和《马可福音》时，他为神的光芒所震撼所征服，在他的流泪祷告中皈依了基督，获得了救赎。这时张生感觉到“就是在地上

¹ “《士师记》记叙了以色列反复背叛与回归的神话情节，并以此为背景讲了一系列传统部族英雄的故事。这个内容给了我们一个大体上是 U 形的叙事结构：背叛之后是落入灾难与奴役，随之是悔悟，然后通过解救又上升到差不多相当于上一次开始下降时到高度。这个接近于 U 形的模式，在文学作品中以标准的喜剧形式出现。……我们可以把整个圣经看成是一部‘神圣喜剧’，它被包含在一个这样的 U 形故事结构之中……”，（加）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20 页

捡起一根草都是美的。”¹，又重新获得了安宁与平和。最后，他又拨通了小柳的电话，象征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恢复，实现了U形的回归。

U形的叙事结构在北村的作品中体现最为明显，如《望着你》中五环和维林的生活和爱情经历等。他的作品甚至形成了固定的“苦难/救赎”的“神性书写模式”²和“神性图式”³。在其他作家笔下U形结构只是隐性的显示，因为作者没有那么明确的宗教信仰，他在借用这种叙事结构的时候，往往将忏悔的对象和救赎的方式作了替换，如王春元的《忏悔无门》、笛安的《芙蓉如面柳如眉》、安妮宝贝的《莲花》等。

王春元的《忏悔无门》也体现了U形叙事结构。李春平是高干子弟，有着远大的理想和令人羡慕的工作，生活似乎一切都是美好的，前途也一片灿烂。但是由于情感的纠葛他参加了一次斗殴事件，被判入狱，生活的苦难开始展现在他面前。李春平苦难的转折是由刘茜引起的，从此他在苦难中缴械，在罪行中沉沦。为了出国李春平费劲心机，并抛弃了自己的女朋友静楠。最终他虽然以爱为代价换来了巨额的财富，但良心上却始终处于不安的状态，忏悔着自己灵魂的缺失。在心理矛盾和情感波澜之中，在自谴自责中，他否定了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并试图寻找摆脱精神的折磨与苦痛各种途径，来获得救赎。在这里，李春平忏悔的指向不是上帝而是自己的良心，但良心的觉醒实际上就是人神圣性的复苏；他获得救赎的途径也不是皈依上帝而是通过慈善活动，在对别人的救助之中，他进一步接近了上帝。“乐园——犯罪——苦难——忏悔——得救”，在历经繁华、罪孽、苦痛之后，走向了平静。

在U形叙事结构中，作者往往更加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袒露和展示，注重对平民百姓生活的描绘。作品中的人物对人生的处境的和人类的境况有一种宗教性的体验，传达了基督教的体认世界的观念，具有启示的意味，是对《圣经》作为文学的叙事艺术的理解基础上产生的借鉴。U形叙事也给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同那些单纯的对苦难的描写的作品形成了对照，将目标指向了未来的救赎，实现对苦难的超越。

¹ 北村：《公民凯恩》，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² 参见吴勇利、王向阳：《解读北村小说“苦难/救赎”的“神性书写”模式》，《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5卷第5期，第65-67页

³ 参见王本朝：《北村与基督教文化》，《涪陵师专学报》，2001年第17卷第2期，第3-4页

第二节 圣歌的创作

基督教最为本质的是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这种信仰是神学研究或任何其他理论、哲学所不能替代的灵魂和生命的状态，侧重感性的体会和领悟。圣歌是传达和体现了这种体会和感悟的重要方式。“圣歌（俗称赞美诗）是基督教文学中的主要部门之一，是基督教徒继续《圣经》之后的伟大文学贡献”¹，在表达对宇宙和自然的赞美，对美的向往和追慕，对生与死的感悟时，诗歌与宗教容易达成一种契合，基督教的圣歌便是这种契合的典型。圣歌通过赞美宇宙、自然或人自身来赞美上帝，它们从宇宙的神奇、自然中景观的美丽和人性中的善良闪光点来显示造物主的神奇和伟大。或在祈祷中表现了静心默想、心神契合的“祈祷”意境，与上帝交通，感受上帝的存在。圣歌的创作是基督教文化给新时期以来文学文体方面带来的影响。

我们首先来看一首圣歌的创作，“奇异恩典”的《儿童诗歌：聆听小雨》：

滴答滴答，小雨下，

滴在屋檐鸟窝上，

小鸟唧唧唱起歌，

歌唱奇妙创造主。²

诗里出现了小雨、屋檐、鸟窝和小鸟四个意象。小雨温柔、轻盈的滴落，屋檐恰恰可以遮蔽风雨，屋檐下的鸟窝是家的象征，鸟窝里的小鸟在庇护之下唧唧歌唱。在这温馨、完美的画面中还夹着雨声、鸟鸣声。这是最简单的自然图景，但又体现了大自然的普遍启示。作者通过这些来称赞上帝的创造，充满了感恩的心态。

齐宏伟的《彼岸的跫音》以诗歌、散文、童话等多种艺术形式，讴歌神圣。这里包含了圣歌的创作。例如《春曲集·255》：

渡过所有“时”的汪洋，

穿越所有“空”的浩渺，

仍无法形容神的辽阔。

¹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81页

² 奇异恩典：基督教文艺网，<http://www.jdwy.com>，2006年11月29日

辽阔无边的神
倾注全部柔情，
创造一粒小小松子。

静托在你掌心……¹

这里首先称赞了神的伟大，是“时”“空”所无法形容的，然后又描写了“倾注全部柔情”创造的“小小松子”。伟大和“小小”形成了张力，而用柔情将两者相连则表现了神对自然的珍重。最后“静托在你掌心”，通过上帝将他如此倾心创造的东西赐给了人类，点明了主旨——神对人格外的恩典。

《彼岸的登音·夏咏集》里面有《晨祷》、《午祷》、《晚祷》、《夜祷》四篇表现祈祷的诗歌。“祈祷当然不是对苦难的掩盖，而是在苦难中向神灵诉求送来神圣的祝福”²，《晨祷》就体现了诉求的力量：

你神奇的触摸在我生命里引起阵阵甜蜜悸痛。

无力割舍的终于割舍。

无由抉择的终于抉择。

无颜接过的终于接过。³

“我”在祷告之中，感受着上帝，感受着上帝的力量，表现了与上帝的契合。同时，在上帝的带领下更新了自己的生命。主耶稣用他的鲜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我们与上帝恢复了关系，改变了“无力”、“无由”和“无颜”的状态。

基督教的圣歌将人和上帝连接在一起的，表达的是对上帝的感情。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还有很多表现赞美和祈祷的作品，如海子的《早祷与泉》，北村的《叹息》、伊蕾的《诉祷》等，他们往往借助圣歌的形式，传达自己对世界的感悟。海子的《早祷与泉》：

早祷，早祷四遍

要想着爱情的黄昏、黄昏

牧羊人的绝壁上

太阳

一葬就是千里

¹ 齐宏伟：《彼岸的登音》，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50页

²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89页

³ 齐宏伟：《彼岸的登音》，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虽然全诗是对生命和爱情消逝的绝望境地的感想和描述，表达了一种忧伤的孤独感，但这里牧羊人具有基督的意象。

基督教文化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提供了新的叙事模式和文体，丰富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的艺术形式。在作家勾画“乐园——犯罪——苦难——忏悔——得救”的历程中展现了对人的处境和出路的思考；而赞美和祈祷的宗教情感也在圣歌中得到了体现，表达了对上帝、自然等一切美好事物的礼赞。

第四章：作家价值观的建构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当今社会中娱乐化趋势的蔓延，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品位和发展方向受着严重的影响。作为精神实践活动的文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抉择。文学的创作环境的恶化，使文学精神价值陷入了极度的失落之中。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在经历了寻根、先锋等流派之后作品倾向于冰冷和阴暗，充斥了狭隘、偏执、暴力和欲望，缺乏对人心灵的尊重和怜爱，缺乏对个体的关爱和悲悯，缺乏灵魂的关怀，作品中的人物虚假、萎缩、丑陋。新写实作家作品拒绝崇高，对琐碎津津乐道；先锋作家，特别是余华对暴力缺乏悲悯的细致描写，对人物内心过于的描写过于冷酷；以“身体写作”自称的女作家对欲望的赤裸而无意义的描写……。暴力和仇恨，欲望和放纵，是很多作家最感兴趣的题材，在他们的笔下，把人降为兽欲或本能的奴隶，缺乏将人进行升华性叙写的的能力。

文坛的恶化反映了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念和判断立场迷失，但这种迷失只是说价值判断呈现出一种混乱，这种混乱给予了人们重估甚至颠覆原有立场的一个机遇和可能，各种思潮和观念介入了这种价值的重构。许多作家正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吸取力量，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对文学创作进行重新的思考和判断。

基督教文化提供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价值，也不是新时期以来文学价值的主流，但他为新时期以来作家的价值观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和思考的方式，他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思想的结晶上，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生活观念带给作家的启示。

基督教文化对新时期以来作家价值观建构的影响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原有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而作家对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念的吸收也和传统文化纠结在一起，呈现出互补的状态。

传统文化中就具有爱的因素，但它往往只是世俗之爱，在此基础上，基督教文化提供了神之爱，促使了部分作家爱的立场确立；批判是文学担负的使命，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作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原罪，体现了对道德批判艰难的超越；在价值指向上，基督教给我们提供了建立在上帝信仰之上终极关怀，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后趋向于末世。

第一节 价值立场——神之爱的介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往往隶属于伦理道德，是基于俗世的考虑，缺乏一个更高的参照体系。基督教文化给我们提供了神之爱，在世俗之爱的基础上有一个神性的纬度。它的介入使新时期以来的部分作家确立了爱的立场，并在作品中有所反映。

一、传统文化中的爱

“爱”是人类共同的主题，是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的因素，只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闪烁着对爱的追求，但最为主要是儒家伦理的“仁爱”。“仁爱”的中心思想是“仁者，爱人”，让人修身养性，达到齐家、平天下的目的，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在传统语境中，爱从来都不是第一要义，他要让位于许多道德训诫，社会规范，一直处在三纲五常的社会秩序的统治之下，处于语言的边缘地位，受到各种力量的压制。爱的支撑力量往往是个人的道德观念，社会的道德制约或者掺杂着轮回的因果报应。

我们在传统文化中看到了世俗之爱，看到了人之爱，但对人之爱的提倡的时候缺乏一个更高的参照体系。在论述爱的立场的时候，只是说爱给我们带来什么，却无法回答为什么要爱，没有依托的爱容易走向空虚和荒诞，经不起追问。面对这个世界，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不是被爱上受挫，而是爱心的丧失。个人无法与世界的荒凉和冰冷，世上的不义与消极抗衡。爱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但在很多情况下，人没有办法去爱，爱的能力的有限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人充满对爱的渴望，爱朋友、爱家人、爱恋人、爱陌生人，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却有各种东西使我们和爱隔绝：世俗的利益、伦理的约束、价值观念的冲突、时间、误会、过失、意外……，最终，人陷入了一种无爱的境地之中。张贤亮曾在《习惯死亡》中描写“我记得我曾爱过我的母亲。但我的导师却告诉我‘不应该’爱她。按阶级分析法她属于官僚阶级，她不应该贪图欢乐生下我这个孽障，我受的所有的罪都从她的快乐开始。于是我的导师把我从我爱的人身上剥离开。”¹失去了爱，人性也开始扭曲和变异。没有强大力量的支撑，爱很容易让位给世俗的价值，而不会成为一种价值立场。

¹ 张贤亮：《习惯死亡》，作家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二、神之爱的介入

神之爱的介入是基督教文化给新时期以来文学带来的新观念。

基督教文化并不是不强调世俗的爱，但在世俗的爱之上，有一个神性的纬度。爱是对狭隘观念的超越。北村对神之爱有切肤的理解，在《爱能遮掩的许多的罪》一文中，他说：

爱是具有神圣感和终极性的。

神就是爱，爱是神的专利和基本的性情。¹

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因为基督教所信的是一位满有爱心的上帝。耶稣曾经说过第一要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马太福音 22：37）“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 22：39），这里体现了爱神和爱人——爱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最大的律法。爱的动力不是自己内心的驱使或伦理的约束而是源自神，源自上帝对人的爱，“上帝不是别的，只是爱，上帝除了爱并没有创造别的。”²。永不枯竭的神之爱，在许多作家笔下是获得拯救，脱离人世苦难的出路。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找我们，才给我们以安慰。如果生命是存在的现实状态，那么爱就是生命的推动力，爱是一，是神圣的道德原则，惟有凭此，人才有获救的希望与可能。

三、爱的立场确立

面对世界，许多作家确立了爱的立场。也通过他笔下的人物传达着这种立场。

北村笔下的人物在困顿之中只有通过上帝之爱才能获得最终的救赎。刘浪在获得信仰后首先竭力去救助他原来的仇敌马大，孙权皈依基督后迫切地为他的情敌马志祷告，张生也在感领了神圣的光照后拨通了给小柳的电话。在此，爱摆脱了的本性而屹立在超越性的神圣根基之上。在这新的根基上，他们的世俗生活才有可能走向全新。至此，人才能承负起现世的恶与生命的苦。这是北村所确立的以上帝为依托的爱的立场。

“爱首先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生活行为本身。一个人仅以爱的理论说明自己在爱，明显是苍白的。”³用行动表现爱，通过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关注来传达爱，是爱的真谛。德兰感受上帝的恩慈，实践着这种爱，更是在确立这种爱。

¹ 北村：《爱能遮掩许多罪》，《钟山》，1993年第6期，第109页

²（法）薇依：《重负与神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³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上海三联文库，1995年，第173页

她超越了财富、种族、国家、宗教，将爱视为天职，走完了自己爱的一生。华姿在对德兰的书写中一直强调她的爱，赞美她的爱，通过对德兰的描写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舒婷为了张志新事件创作的《遗产》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爱所强调的爱得观念中的“泛爱”，“她希望用‘爱’的精神来拯救世界和人心，驱除黑暗，完善自己和他人的道德人格和精神本性。”¹舒婷笔下的爱具有救赎意味和牺牲精神，可以明显的看出其中的基督教文化影响。

在探究爱的立场的时候，恰好可以将余杰与北村的“爱”做个比较。两个作家都将爱提到了至高的位置，指出我们爱的缺乏和爱的重要作用。但北村所强调的是上帝之爱。上帝是爱的源泉也是爱的终极指向，我们爱的能力是源于上帝对我们的爱，当“罪”将我们和上帝隔绝的时候，也将我们和爱隔绝了。而余杰强调的却正是在世俗生活中爱的重要意义，在吸纳基督教文化的时候将上帝置于隐藏的位置，爱本身成了一种原则，成了面向世界的武器，成了信仰的对象。而余杰爱的源泉来自“古今中外伟大的心灵和高尚的思想”，是对人之爱的赞扬和吸收。北村的作品虽然有概念化的嫌疑，上帝过于显露的位置也容易引起人的怀疑和诟病，但是神的位置提供了包容恶的力量和容量，人面对现世灾难和不幸而保持信心。

基督教文化给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带来了神之爱，在神之爱的基础上部分作家确立的爱得立场。他们用爱来观察这个世界，用爱来进行文学创作和书写，与新时期暴力、欲望、仇恨等的书写形成了对比。这种爱的立场的确立为新时期作家价值观的建构提供了一个纬度和方向。

第二节 批判对象——原罪

认识人，认识人性，是文学担负的一个使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批判往往归结到道德层面，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使我们看到了身上的“原罪”，有了对“罪”

¹ 张高杰：《舒婷诗歌中的基督教文化精神》，《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第45页

的批判。虽然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道德批判依然是主流，但作家已经开始了道德批判的艰难超越。

一、传统文化中的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发展了一种实用的理性文化，渐渐丧失了对人类与外界的分裂与对立以及人性的自身矛盾的尖锐感受。中国文人常常把自己感觉到的社会矛盾归入帝王的政治治理中的偏颇和失败，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灾难和不幸都归罪于偶然性或个别人的道德品质。如对文革的反思，大多数人很难超越政治运动或个别人的别有用心角度。因此，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的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伦理层面，指向道德。

伦理道德的批判是批判中必然的一部分，但是在传统文化中在伦理道德之上缺乏更高的超越。因此完美的道德理想成了比照的对象，道德的完善往往成了追求的目标。

二、对原罪的批判

这里的罪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刑法上的犯罪，而是指原罪和原罪带来的人的罪性。“罪有原罪和本罪两类。原罪使始祖留下来的，如自私的心。本罪使自己故意犯的罪。如不认识神、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¹。罪是一种分隔，亚当、夏娃的原罪带来了五方面的分隔：人与神、人本身自我、人与人、人与动物界以及人与自然的分隔。

“罪”的表现之一是人的自以为义。人类偷吃禁果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人弃绝上帝的诫命，试图摆脱受造地位，同上帝平等的愿望。它在现世的表现就是人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获得救赎。陈清、康生等人都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试图活出一种“纯洁”，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战胜罪。但最后他们往往陷入罪中无法自拔。批判自以为义，是对人类有限性的一个认识和肯定。

“罪”表现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对现世的偶像崇拜。“凡事自制神像，雕刻佛像，或用任何形式来代表代表神加以膜拜都使拜偶像的罪，包括今天把金钱、性欲、知识、地位、美貌、财产等等封为神明的行为在内。”²刘浪、马大对金钱和权势的追逐，周渔、陈清对爱情的信仰，孔成、海娃对诗歌的膜拜等都是偶像崇

¹ 白石：《基督教要道阐释》，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² 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寻》，《花城》，1996年第6期，第30页

拜的例子。金钱和权势只是现世的享受，爱情和诗歌虽然是善的表现但却远远不是善本身。它们可能会给人短暂的满足，但对它们的崇拜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救赎，不能获得人生的超越。

余杰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基督教终极价值观念的影响。他的批判既指向他人也指向自己，既有学理的分析也有情感肆意的宣泄，既有学术状态的探讨也针对社会的讨伐。余杰在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时候，显示了基督教文化对他立场的影响。他提倡知识分子的自由，不依附于现世的政权，不顺从金钱和物质，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态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批判资源往往表现出对政权的暧昧态度，为政治服务的内心渴望，甚至于文人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之下，产生了极力阿谀政治的心态，谋求官方的认可成为他们创作的目的。虽然我们从“五四”开始既高举自由的旗号，但在精神的纬度，自由始终是举步维艰。很多知识分子参与消解政权和人民的对立，将热爱党和热爱人民进行了完全的统一。继承传统的批判精神，往往无法真正的理清创作与政权的关系，但基督教文化却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对原罪的批判中超越了对政权的认同，而且为这种超越提供了神圣的纬度。

三、对道德批判艰难的超越

道德批判仍然是文学中批判的主流，但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基督教文化的关照下，作家试图脱离简单的伦理层面，对道德批判开始了艰难的超越。

北村《我和上帝有个约》将陈步森与陈三木道德上的对立呈现在读者面前。陈布森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构成了刑法意义上的犯罪，陈三立在司法中保持着一种清白，但在道德的法庭中，显然后者才是一个罪犯。故事对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出了拷问和质疑，具有道德批判的意义。但陈布森和陈三立最根本上的区别却不是道德层面，而在于是否认识自己身上的罪，是否认识上帝；在于依靠个人还是依靠对上帝的信。只有在对自己罪的真实体认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最终的救赎。

在余杰的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对高尚道德的赞美，对道德中的阴暗进行批判，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余杰笔下对道德批判的一种超越。从《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开始，余杰在他的价值建构中确立了“忏悔”的地位，因此，这

篇文章对于了解余杰的忏悔观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忏悔”无法回避谁忏悔，忏悔什么和向谁忏悔这三个问题，正是在探究这三个方面时我们可以发现了余杰“忏悔”中的某种缺失。从表面上看，余杰对余秋雨的“忏悔”要求就是一种僭越，因为只有上帝才有权利要求人的“忏悔”，人只能在“知罪”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就忏悔的内容来说，余杰依然是从道德的角度入手，指摘的是道德上的缺陷。从忏悔指向的角度来看，没有外在超越的神性目标。这些反映了余杰忏悔观念的混杂，与基督教忏悔观有明显的区别，但当我们进行深入地挖掘的时候，依然能看到基督教的“原罪观”、“忏悔观”对余杰的影响。对余秋雨忏悔的要求实际上有一个隐含的出发点，就是将自己和余秋雨纳入中国知识分子这同一个体系之中，成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他忏悔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要求，在他随后的《我有罪 我忏悔》中就表明了这一点。余杰对余秋雨道德上的指责实际上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本性中对政权的依附的批判，不过是以道德缺陷道德形式出现。而这种批判的对象恰恰也是对原罪中偶像崇拜的批判。他的价值指向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层面的一个超越，不是上帝这一基督教意味浓厚的宗教实体，但这种超越实际是对终极价值的一个无限接近。在这里，余杰实际上完成了对道德批判的超越。

对道德层面批判的超越艰难源于对原罪观念体认的艰难。“中国人对罪的理解的另一个方面是，罪是与道德上的‘恶’紧密关联在一起的，犯罪一定意味着做了恶事。这也就是说，中国人对罪所持有的是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理解。”¹没有罪人们往往认识不到罪，只有在对罪行的批判中，透漏着对罪性的认识。

当然，我们需要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批判，作家笔下的这种批判对社会、对人生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批判精神一种体现。但同时，我们更需要对这种批判的超越。

对罪的批判和这种批判中道德层面艰难的超越体现了新时期以来的部分作家试图用基督教观念来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念，但却总受传统文化的桎梏的境况。也反映了新时期文学中对原罪的批判往往夹揉在道德批判之中，原罪也总是以道德缺陷的形式出现。这种杂糅是文化发展中的必然，也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提供

¹ 高喆：《“原罪”释疑》，《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156页

可更多思考的角度。

第三节 价值指向——终极

对终极的追求是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体验和思索的一个方向，基督教给我们提供了他所独有的终极观念。这种终极关怀建立在上帝信仰之上，而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后趋向于末世。但末世不是终结，而是新的开始。基督教的终极观念影响了新时期以来的部分作家，特别是对这种宗教信仰了解深刻的作家。他们通过他们的作品呈现出这种终极观念对他们的影响。

一、对终极的追求

任何人，不论他是否信仰宗教，在其精神结构中都有—种托付其人生，引导其行动的价值关怀。这是因为人的存在本质上不同于物的存在，总是要面对生命的下一时刻的选择，而为了实现这一选择人就必然赋予周围世界以及自己的行为—种统一的解释，以此来对各种可能的行为以及结果做出分析和评价。人赋予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根据主要来自人的现实生活的各种需要，这就是价值乃至终极价值产生的基础。人对世界的关怀分为初级关怀和终极关怀，人对衣食住行的关怀和焦虑—般的初级的关怀，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现实的。但在这之上还存在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世界的关怀，对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的追问。而宗教所关心的也是这样—种与人的生存本质密切相关、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而它所提供的也正是这种终极问题的终极价值。终极是新时期以来作家体验和思索的—个方向。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描绘了—个个在尘世跋涉、寻觅的灵魂，描绘了对价值的追求。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期，多种价值观念并存，文学的价值观也随之出现了多元共生的局面。文学价值多样性在民主平等的现代社会必须多元共处、互补。文学价值观具有层次性，文学的终极关怀是其最高使命，处于引导地位。

中国传统终极价值观就是儒学所构筑的“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志在仁义”的精神价值体系。它的传承主体，主要是由中国士大夫阶层——古代的知识分子构成的。缺乏彼岸的关照是中国文化的—个特点，他更加关注社会伦理和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信仰，不是寻求人生与某种永恒神圣本体的沟通，而是把人生与—定的社会理想联系起来。最终价值标准往往都落实到现世中。中国文化传统—向具有重视人生哲学和现实世界的伦理特点，注重经世致用。中国文学也—直都缺乏

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作家被现实捆绑得太紧，作品里的是非道德心太重，因此，中国文学流露出的多是现世关怀，对此岸的临摹，而缺乏一个比这更高的灵魂审观点，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

二、基督教的终极观念

基督教文化具有独特的终极观念。这种终极是建立在对上帝信仰基础上，上帝是价值的源泉。同时这种终极追求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的价值指向只是向真理的无限趋近，而不可能达到完满。基督教的末世观念也具有其独特性，他不是一种终结，而是新的开始。基督教的终极观念影响了新时期以来的部分作家，特别是亲近基督教或具有宗教信仰的作家。

1、就基督教来说，它的人生终极关怀完全是建立在上帝信仰的基础上。上帝成为人生价值的源泉和根据，上帝观念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内容，这是唯一的基础，再没有另外的基础。人类因始祖亚当滥用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忤逆上帝，犯下原罪，从此，人类失去了独自向善的自由，靠知识无法自救，只能期待上帝恩典的拯救。虽然幸福是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对永恒不变的东西的追求。但是，这一目标不可能在尘世达到，任何有限存在物和外在的善都不能使人满足，不能确保人内心的和平，幸福只能在永恒不变的上帝那里找到：谁拥有了上帝，谁就是幸福的——对上帝的指向是其与其他宗教或文化对终极价值追求的不同之处。

由于北村的信仰状态，他的作品中呈现出来的终极追求具有明显的上帝指向，而他自己的写作宣言也将上帝作为价值的源泉。像北村、余杰这一具有明确的基督教信仰的作家在新时期文学中较少，更多的作家将上帝的观念泛化，将上帝置换成良心、道德、美和善。

2、在上帝信仰的基础上的终极观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一个因世界的无限性和人类认识的无限性决定的，由相对真理不断向绝对真理逼近的过程。对彼岸世界的追寻是基督教文化的一个价值指向。完满不可能一日达到，超越也就永远没有止境，彼岸永远存在，这样，信仰才得以延续。皈依并不在一个处所，皈依在路上，是一个过程。

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表达了对终极最深切地理解和在路上的生命状态。以弹唱说书为生的瞎子们靠一个信念来支撑自己不断拉琴——只要他弹断一定

数量的琴弦，就能在琴槽中找到一种使其重见光明的药方。这一信念成为他生存的精神支柱，但实际上所谓药方只不过是一张白纸。老瞎子的师傅弹断八百根琴弦之后知道了这个秘密，临死前将虚幻的信念传给徒弟，告诉他要弹断一千根弦才能治愈盲疾。老瞎子用五十年时间弹断一千根琴弦，最后也发现这个谎言，信念轰然倒塌，他的所有努力都变成了无意义。但在死前悟出这一虚幻信念的意义，是为了支撑原本虚无的人生，使生命的琴弦能够绷紧，以弹奏生命的音乐。于是，他又将谎言继续传递下去，将琴弦数增加到一千二百根。“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小，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蹿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也无所谓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¹这是对人生状况对真实写照，目标和彼岸很多情况只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没有现世的意义，但同时也是不可舍弃的，引导我们整个生命和生活。同时史铁生并不认为自己手握终极真理，可以以救世主或思想先知自命。在他那里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们可以对终极发问，却不能赢得终极的解答，自由与爱，总是以问题的方式而不是答案的形态，存在于我们的心灵。这是对我们思维方式的一个突破，对终极的追问不一定非要有一个结果，追问过程本身就具有价值意义。

3、末世是上帝的终极追求中独特的观念。《新约·启示录》可以说是新约末世启示的总结，它借用犹太教启示文学的形式，写出了基督徒的末世盼望。末世是终极未来的指向，也是基督教提供的独特的价值指向。“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 9：27），这是《圣经》中关于人最后归宿的描写，“根据《圣经》传统，世界历史不是从人类的堕落开始，因而也并非以世界的毁灭告终。它从尘世被造物的最初的祝福开始，并永恒的创造物的天堂喜乐告终”²。末世不是终极，是新的开始。“基督教对未来的期望同这些最后解决毫无关系，因为它所关注的并不是‘生命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或‘世界的终结’，而是开端，正如 *Nicene creed*（《尼西亚信经》）所说的那样，是永恒生命的开端。这是尘世世界（即尘世和尘世的被造物）终结之后上帝的新开端。基督教盼望的，正是终结中的开端。”³

¹ 史铁生：《第一人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

² 王晓朝、杨熙楠编：《现代性与末世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4页

³ 同上，第224页

在《我和上帝有个约》中，陈步森接受了现世的惩罚，走向了刑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他的肝脏移植给冷薇，实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复活。冷薇的生命承载着两个人新的生命，所有的恩怨都已经过去，只有爱和感怀留在心间。陈步森的结局带有末世的色彩，末世的观点不是终结而是开始，是新的开端，是新的生命。陈步森在个人生命的终结后，却得到了新的开端。

德兰对生命有着独特的认识，“死亡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是生命的延续。”德兰具有深厚的宗教背景，她对人类归宿的认识直接指向了新的生命。余杰《压伤的芦苇》中有这样的描写：“朋霍费尔给狱中难友的最后告别是：‘这就是结局。但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他尘世生命的终结，正是永世生命的开端。他向今世的黑夜道晚安，醒来，却要在永世的黎明道早安”，终极的观点影响着书中的人物，同时也影响着作者。

基督教文化为我们提供了终极这个价值指向。这是在上帝信仰基础上的终极观念，反映了人不断探寻和求索的状态，并让人看到了末世重生的希望。在这个价值指向下，人们对现世有所超越，将目光投入到彼岸。

一种价值观念无非是回答他赞扬的是什么，批判的是什么，终极指向是什么，基督教的价值观念也是在这三个方面影响着中国新时期以来的部分作家。对爱的推崇，用爱作为武器来面对这个世界，是接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作家们首先和最普遍接受的理念。以爱为原则，他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人类自身的缺憾，即有道德上的不足，又超越了单纯的道德指责，有对人类罪性的认识。而这些都指向了终极关怀，指向了作家对终极的理解。

结 语

爱，面对死亡的恐惧，对自我的认知，对命运和苦难的感慨等是人类共同的话题；异化、孤独、遗忘、不平等、与地球的张力，是人类共同的困境；亲情，友情，爱情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对真、善、美和永恒的追求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面临着共同的生命困惑和生存困境，寻找着各自的解答。基督教在追问和解答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

基督教文化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文化之一，有对这些问题的独特解答方式和话语系统。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影响了新时期以来的部分作品的创作，也对作家的精神世界有所启示。他丰富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的语汇，扩大了语言的表达空间增强了文学表现能力；扩大了书写范围，充实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内容，塑造了一系列的基督教人物形象。同时基督教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影响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缺失：大多数作家只是从表层来吸收基督教文化，较少涉及精神内涵，他们对《圣经》也存在误读和曲解，由此，作品中批判和皈依呈现了简单化。

一、 价值意义

1、丰富了新时期以来文学语汇。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吸纳了很多基督教语汇，使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在表达上有了宗教的色彩，扩大了文学的语言空间和增强了文学的表现能力。简单的语汇往往营造了宗教的氛围，引发人的哲思。语汇背后的含义也帮助读者更加清晰的理解文章的主旨。而在语汇的使用过程中，也显示了作家个人的审美欲求和情感选择，诱发并激活了新时期以来的语言创造，体现了文学宽容和文学创作的多元化。

2、充实了作品书写内容。首先扩大了作家书写范围，充实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内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生动地展现出新中国成立后基督教以及基督徒的坎坷命运，塑造了诸如李宁、南珊、詹牧师、刘浪等基督徒的人物形象，以其各自不同的面貌充实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人物画廊。同时，展示了人们对宗教的认识、评价、和判断，反映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基督教信徒的命运变化，描绘了人物的复杂的内心活动。同时，这些人物对于了解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不仅能在作品中看到不同的神父、牧师、传教士和普通基督徒等基督教人物形象，还能读到关于教堂、做礼拜、圣诞节这些特殊的具

有宗教氛围的场景描写,更有一些作家在作品中将基督教信仰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和思想加以表现。这些作家已不再仅仅把基督教文化视为“异国情调”的一种,而是表现出探究甚至接纳的感情。同时,还提供了新的书写主题。基督教文化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提供了苦难与救赎、原罪和忏悔、爱等主题,他们的的书写显示了关注人人生存价值的宗教情怀,并在此基础上表现了对人类存在本质的痛苦和思考,体现了对人终极价值的关怀。

3、为作家价值观的建构提供了方向。许多作家正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吸取力量,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对文学创作进行重新的思考和判断。基督教文化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新的纬度和方向,提供了对待文学的良知态度。爱的立场在部分作家那里确立,并在笔下呈现了对原罪的批判,将价值指向确立为基督信仰下的终极观念。

二、缺失

新时期文学在接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时候也存在一定的缺失:

新时期以来文学中反映的基督教文化影响主要集中在宗教词汇和宗教生活方面等表面的层次,对精神内涵涉及过少。作为一种思想的资源,他没有能够引起更多的探究和表述。同时,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基督教文化学识整体上比较匮乏,他们缺乏宗教研究的背景,《圣经》往往单纯的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出现在他们的眼中。中国作家对《圣经》和基督教文化存在一种误读和曲解,个人色彩过重。虽然这样的理解也是解读《圣经》的一个正常的方式,但这种过于私人化的解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势必导致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不能很好的吸收基督教的文化资源,而只是一些个人化的理解。

正是由于对基督教了解的不够深入,新时期以来的创作中常常过于简单地看待与描写基督教文化。在很多批判基督教文化的作品中,只是从唯物唯心、进步落后的角度展开,并没有触及宗教的内在本质,因此,批判缺乏力度。同时,也有作家将对基督教的皈依视为拯救世人唯一的出路。这样理解的实质同简单的批判一样,也是对基督教文化的某种曲解。

参考文献：

1. 《圣经》，中国基督教两会，2004年
2. 刘光耀、孙善玲等著：《四福音书解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
3. 刘晓枫编：《基督教文化评论1》，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编：《基督教文化评论2》，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编：《基督教文化评论3》，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编：《基督教文化面面观》，齐鲁书社，1991年
7. 白石：《基督教要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
8. 白石：《基督教要到阐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
9. 〔美〕沃尔斯托夫：《艺术与宗教》，工人出版社，1988年
10. 〔美〕勒兰德·莱肯：《圣经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
11. 〔英〕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12. 秦家懿、〔德〕孔汉思著：《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0年
13. 〔美〕查尔斯·L·坎默：《基督教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14. 〔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三联书店，1997年
15. 〔德〕莫尔特曼：《俗世中的上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3年
16. 〔加〕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7. 〔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8. 〔法〕薇依：《重负与神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9. 〔德〕艾伯林：《神学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0. 〔英〕托伦斯：《神学的科学》，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1. 〔英〕麦格拉思：《基督教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2. 〔以色列〕西蒙·巴埃弗拉特：《圣经的叙事艺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3.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 年
24.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三联书店，2001 年
25. 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三联书店，2003 年
26. 董丛林：《龙与上帝》，三联书店，1992 年
27.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 1500 年》，人民出版社，1994 年
28. 许志伟，赵敦华编：《冲突与互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29. 何光沪，许志伟编：《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
30. 董小川：《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商务印刷馆，1999 年
31. 梁工、卢龙光编：《圣经与文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
32. 何世明：《中华基督教融贯神学刍议》，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
33. 杨腓力：《耶稣真相》，校园书房出版社，2004 年
34. 罗明嘉、黄保罗编：《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处境神学中的中国—
北欧会议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35. 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36. 陈树林：《危机与拯救》，人民出版社，2004 年
37. 王晓朝、杨熙楠编：《现代性与末世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38.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年
39. 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年
40. 王列耀：《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年
41. 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年
42. 杨剑龙：《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江苏社会科学，1999 年
43. 王本朝：《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年
44. 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5. 刘丽霞：《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46. 北村：《爱能遮掩许多罪》，钟山，1993 年第 6 期
47. 朱必圣：《由怀疑到信仰》，当代作家评论，1995 年第 4 期

48. 南帆:《先锋的皈依》,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
49. 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
50. 北村:《活着与写作》,大家,1995年第1期
51. 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1995年第4期
52. 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寻》,花城,1996年第6期
53. 孙绍振:《〈水土不服〉:绝望的写作》,小说评论,1996年第2期
54. 王本朝:《北村与基督教文化》,涪陵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
55. 杨剑龙:《论北村的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56. 从新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
燕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8期
57. 吴勇利、王向阳:《解读北村小说“苦难/救赎”的“神性书写”模式》,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58. 孙羽中:《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建构》,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期

后 记

几经修改，论文终于定稿了。看着自己并不满意的论文，看着即将到来的答辩、毕业和离校，怎么也轻松不起来。

论文选题的确定，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王文胜导师“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给我开启了探究宗教信仰的大门；一是自己对余杰的关注，他的《压伤的芦苇》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一个人从愤怒到满怀爱总是有原因的，他告诉我是因为基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自己也是抱着浓厚的兴趣选择了这个题目，但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却发现，真是困难重重。首先是自己基督教文化的匮乏，在对他的内涵、实质、变化的把握上感到无力。其次就是文本阅读的匮乏，因为自己的研究并不是在本身就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还有就是文化影响文学这一课题本身具有的复杂性，让我难以明辨。

文章截稿了，但自己也看到缺陷、纰漏太多，实在有些愧对自己这几年的学习，愧对老师的谆谆教诲。

在此，首先要对我的导师王文胜老师献上真挚的感谢和敬意。是她启发了我研究这一课题，从选题到写作的过程中，她又给了我很多帮助，介绍了相关的书籍，提供了很多思路，并不断纠正我研究方向上的偏颇，我使我的研究最终可以落实到文学。

感谢朱晓进老师、杨洪承老师、何言宏老师、高永年老师、贺仲明老师的指点与教诲，是老师们带我走进学术的殿堂！

感谢金陵神学院的贾琼等同学，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基督的形象——爱心和热心。

感谢我的舍友，孙波、鲁丹、林华珍，在我困惑的时候给我的帮助和安慰。

感谢我的同学，特别是姚淼，给我论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2007年3月30日

孟宪爽